



珍藏版

拾貳

山東畫報出版社

老照片

# 老照片

卷之二十一



山東畫報出版社

一代报人余纪忠先生 徐宗懋

熊斌其人 刘鹤守

罗隆基生命中的几位女性 蔡登山

莫理循的家事 林冠珍

我的父亲 邢小群

我的爷爷和奶奶 于大水

一张照片与背面的题识 樊建川



## 目 录

<b>徐宗懋</b>	<b>一代报人余纪忠先生</b>	<b>1</b>
	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一位宝岛年事最高的“上班族”。台湾的新闻舆论已发展到可以影响体制和政策的地步，余纪忠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	
<b>刘鹤守</b>	<b>熊斌其人</b>	<b>26</b>
<b>蔡登山</b>	<b>罗隆基生命中的几位女性</b>	<b>31</b>
<b>林冠珍</b>	<b>莫理循的家事</b>	<b>46</b>
<b>邢小群</b>	<b>我的父亲</b>	<b>53</b>
	一个没有大坎坷但也不走运的作家，一个常人都视为很好的同志，一个让儿女心寒的父亲，一个妻子不希望与其同穴的丈夫……	
<b>于大水</b>	<b>我的爷爷和奶奶</b>	<b>77</b>
<b>史际平</b>	<b>不尽的思念</b>	<b>89</b>
	作者在昆明郊外的“魁阁”脚下久久徘徊，遥想当年父辈们经历的种种艰辛，感叹父辈们取得的学术成果……	
<b>张建美</b>	<b>母亲的百年人生</b>	<b>108</b>
<b>高 信</b>	<b>桂 芳</b>	<b>116</b>
	虽然她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二十五年，但她把自己的艺术才华献给了人间，她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b>樊建川</b>	<b>一张照片与背面的题识</b>	<b>121</b>
<b>程以正</b>	<b>一部庚子时期的老照片影集</b>	<b>124</b>

张 瑾 故乡别后的安慰	132
汪 伦 我能解开六分之一的“谜底”	140
徐 如 我的三个大学	145
梁尚之 大学生活片断	156
陶中源 清华附小的冰球队	168
当年的少年队员如今都已年逾花甲，虽然天南海北，冰球运动仍是他们的挚爱……	
冯克力 两代报人的不懈追求	172

---

出版人 郭海涛  
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杰  
特邀编辑 丁东 邵建  
美术编辑 王芳



# 一代报人余纪忠先生

徐宗懋

余纪忠先生过世已经五年了。

他的丧礼我没有出席，他在常州老家的永眠之地，几年里我也从没有去凭吊过。在外人眼里，我对余纪老似乎有些失礼了。其实我是一直不愿意正视与接受他已经永远地走了这一无情的事实。

人生之路要走得开，总需要一两位前辈带路，余先生是我的伯乐，也是许多人的恩师。我们结缘近二十年，虽然并非朝夕相处，但却一直感受到他的宽容与关切。1983年，我进入台湾《中国时报》工作时，还是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全世界的重担都在自己的肩上，做事情不太思前顾后，虽然工作上偶有斩获，但也捅了不少娄子。后来，我跟其他年轻的同事才知道，所有的麻烦他都帮我们扛下来了。他能这么做，原因是他在我们身上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

## 自动请缨的中央大学学生

余纪忠，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为近代台湾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做出重大的贡献。1910年余先生生于江苏常州，先是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后考入东南大学改制后之中央大学。这所大学专门培养未来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人才，学生都是一时之选，不



图1 1934年，二十四岁的余纪忠就读于伦敦政经学院。

仅有崇高的爱国热情，也不乏杰出的专业能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热血青年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对日宣战，南京学生更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余纪忠就是带头闹学潮的学生之一。



图2 1934年，爱国青年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前请愿，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对日宣战，余纪忠亦身在其中。

不久日军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将战场由东北移到中国的经济重心上海，由于日军意图不明，情势紧急，蒋介石划全国为五大防卫区，实行动员。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师由郑州南下布防，总部就设在常州清凉寺。余纪忠通过何浩若教授引荐，向胡宗南请缨。相谈之下，胡对眼前这位年轻人十分欣赏，当场罗致。不过，这场由十九路军担任主力的战役只持续了月余，双方随即偃旗息鼓。胡宗南的第一师回防河南，余纪忠也结束了短暂的军旅生涯，返回学校。离开前余对胡承诺，只要国家有难，他将立即投效。

1934年，余纪忠漂洋过海，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读书，亲身体会西洋文明。“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立刻整装回国，投入抗战行列。他由浦口北上徐州，再由陇海线转往西北，在西安郊外找到胡

部所在。此时的胡宗南见余纪忠信守承诺，大呼难得。余纪忠旋被任命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后升主任)，兼校刊物《力行》月刊主编，同时兼胡的机要。抗战期间，胡宗南部兵强马壮，作为胡的政治机要，余纪忠参与许多重要工作的规划，整理文件，并协助撰写胡宗南的讲稿。1995年胡宗南百岁冥诞纪念之前，余先生向文史专家苏澄基(亦为《中国时报》编辑同仁，两年前过世)先生口述说：“西北冬季酷寒，气温常降到零度以下，胡将军为示与士卒同甘苦，屋里从不生火炉。他不生炉子，大家谁也不敢生，几个寒冬刺骨的冬天，就跟他这样咬着牙根度过。……他不睡，我们也不能睡，他一大早起床，我们又得赶在他前面起来。那时除部队外，西北地区的重要党政机构，胡也负责督导，常常临时通知第二天要到某地讲话，须准备一篇稿子，碰到这种情形，那天晚上就没得睡了。”由于同时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也经常到部队演讲，其才干在军政界逐渐为人所识，到了1944年底，他离开了西北，被调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及青年军203师政治部主任，当年在重庆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任职的易劲天(来台后成为国民党要人)听过余纪忠的演讲，他后来写道：“余先生从国际形势、国内战局一直谈到抗战前途和建国展望，旁征博引，精彩丰富，不但学生听得洋洋有味，就是我们也闻所未闻。”

## 抗战结束后调往东北

抗战胜利后，身在军旅却难脱文人本色的余纪忠，原想脱下军装，重返英伦，继续他因抗战而中辍的学业，不过中国内战乌云密布，他很快接到调令，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宣部东北特派员、东北行营新闻处长。当时东北是国共两军最重要的战场，国共两党都把最精锐的部队、最杰出的人才派到东北，而出掌国军东北三十万精锐部队政治部主任工作的余纪忠那年只有三十六岁，其受器重程度可见一斑。



图3 1942年，余纪忠与蔡玉辉在西安缔结连理。

1946年5月，余纪忠随部队进入沈阳，并且参与了激烈的四平之战。这是国共内战初期国民党取得明显优势的一次战斗。由于中共方面对战情判断有误，在军事和政治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投入正面决战，造成新组建的十万林彪部队严重的挫败，向哈尔滨仓皇撤退。亲临现场指挥战局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力主国军不顾一切，乘胜追击，迅速取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让林彪部队



图4 1946年5月，初到沈阳的杜聿明。余纪忠说，杜后面那位戴眼镜被遮住脸的军人就是他。

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不过蒋介石却迫于美国的压力，于6月6日下令停战，使得解放军获得了四个月的宝贵时间。到了台湾的蒋介石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也承认那次的停战令是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真正关键。2000年时，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为父亲撰写回忆录，为了收集资料，特别拜访余先生谈那一段历史。白先勇写道：“余先生回忆，父亲(白崇禧)就在锦州往开原的火车上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除了东北将领外，还有吉林省主席梁华盛、旅顺市长朱锐元、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李俊龙，余先生也参加了。父亲一连声问杜聿明：‘你有没有把握把长春打下来？’杜聿明说有把握。父亲说：‘那么好，你说你有把握，那你就下令进军，南京方面由我来负责。’说完便向南京方面发电报向蒋中正主席报告实况。那封历史性的电报，便是余先生在火车上拟的。”

此外，余纪忠在沈阳以中苏友好的名义，运用日本《朝日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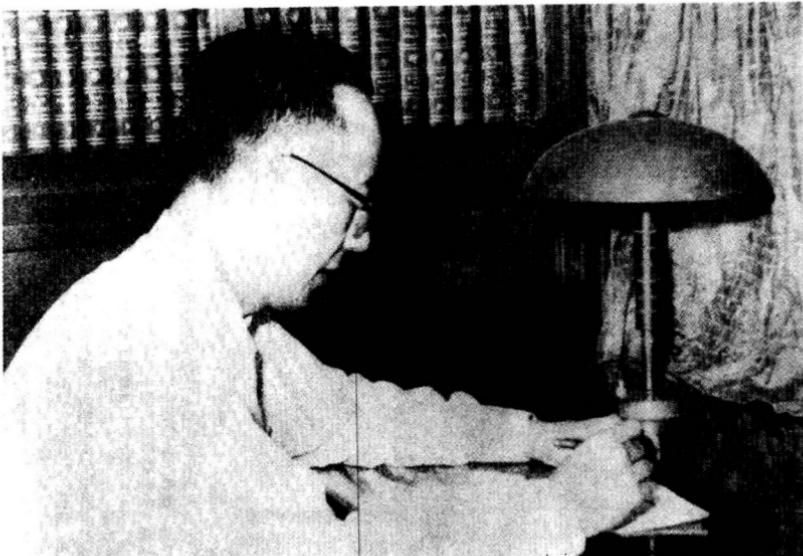


图5 1950年代初，在台北创办《征信新闻》的余纪忠在灯下写社论。

东北版的报社印刷机，创办《中苏日报》。这份报纸旨在宣传国民政府的政策，不过余纪忠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本性也流露无遗。以该报社论《总动员中的言论与新闻自由》为例，在国共战争如火如荼的一刻，他作为国军政治部主任竟还大谈“新闻自由”，确实引人侧目。这种情形反映了余纪忠真正心仪的还是新闻事业，军队中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只会扼杀他的才华，官场上逢迎拍马更为他所不屑，他最终还是要回到“言论报国”这条路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危亡之秋，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不少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两党的理论体系都有追求心灵解放自由的一面，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互契合。然而，当政党逐渐发展成统治机器时，这种自由主义精神就会与政党组织的实际运作发生冲突。在对日抗战期间，由于敌人是外侮，战斗目标一致明确，知识分子和政党之间较少矛盾；不过国共内战却属于中国人骨肉相残，涉及到中国现代化



图6 1950年,余纪忠与二女余似华。

和民主化的问题,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经常也有党员身份)很容易与政党政策出现不同的意见。这也解释了为何国民党的自由派常被指为“中共同路人”,而共产党的自由派常被诬为“国民党特务”。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有些甚至是很悲惨。可是为何余纪忠这样一位国民党中的自由主义者最后不仅生存下来,还开拓出一片天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其中有他个人才干的原因,也有台湾大环境的原因。

### 在台湾重启人生之路

1947年底,余纪忠终于难以承受国民党军队派系倾轧、内斗无

度的现象，从东北调回南京，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秘书（主任委员为蒋经国），这是一份闲差事，他自己跟友人说“这个单位最好结束算了”。这段赋闲时光也是余纪忠重新思索自己人生定位的时机。1948年9月，他辞去党职，举家迁台，来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又回大陆一趟，在溪口拜见了蒋介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原本的国共内战从此转化为大陆与台湾长期对峙的局面，也就在这一年10月2日，余纪忠在台北市开封街创办了《征信新闻》，初期为四开油印的报纸，内容以财经新闻为主。初到台湾之时，两袖清风，幸赖母亲储太夫人变卖南京祖业，手头存有约十万台币，全交给儿子创业。一开始的工作和生活极其艰困，余纪忠后来常跟访客提到，这份报纸第一次印出来的时候，他自己提了一捆，骑着脚踏车沿街叫卖，第一天卖出七份。此时的余纪忠刚好四十岁，体力



图7 1950年代，《征信新闻》的发行人员最初骑单车分派报纸。

与脑力达到了巅峰。他具有文人的浪漫和洒脱，但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书生，他具有丰富政治历练，能够准确地掌握权力生态与时代演变的微妙分寸。在“戒严”时代，民间是不准许自由办报的，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其创办人与执政当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被认为他们发行的刊物有助于宣扬政策，争取民心；尽管如此，民营报纸的经费是自筹的，利润来自市场机制，因此民营报纸必须在执政当局的态度与读者自然的需求中保持平衡，这是一套走钢索的高超技巧。严格说起来，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懂得这个道理。差别在于，有些人冲得太猛，惹祸上身，大多数人被动地跟着情势走，只有极少数兼具专业能力、政治胆识以及商业头脑，能够在一些几乎看不见的夹缝中脱颖而出，进而鼓舞了整个社会向前迈进的精神。

## 《中国时报》延续《大公报》的精神

余纪忠最佩服过去《大公报》正派理性的办报风格，欣赏《大公报》严谨的立论，也时时以《大公报》的文风的继承者自居。在东北创办的《中苏日报》是他主导的第一份报刊，可惜为时太短，掣肘仍多；现在的《征信新闻》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业，可以充分发挥。此外，《征信新闻》的发迹跟当年《大公报》的情况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余纪忠带领几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从竹篱笆围的简陋办公室起步，轮流执笔，每天挑灯工作。由于采访经费和资源有限，只能依靠社论的立论和风采来吸引读者。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这样的言论无疑是重要的精神食粮。创刊的来年，《征信新闻》扩版到对开一大张，到了第四年，《征信新闻》增加国内外要闻及社会新闻，增辟地方新闻，初具综合性报纸的规模，发行面由工商界扩展到社会各阶层。

1954年，《征信新闻》迁址台北市大理街132号，购买《香港时报》汰换之印刷设备，自建工厂，改变过去排版印刷委外的情况，掌握了工作流程上的主动权。此后数十年，这份报纸紧紧扣着台湾



图8 1950年代,《征信新闻》举办冬令救济活动。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脉动，与台湾一起成长，共同飞跃。1968年，余纪忠先生看见报业竞争激烈，照相制版彩色印刷已成为大势所趋，毅然决定贷款，订购美国高斯公司奥本尼式彩印转轮机，同时将《征信新闻》改名为《中国时报》，使得《中国时报》成为亚洲第一份彩印报纸（过去亚洲只有杂志使用彩印，报纸最多为双色）。由于《中国时报》不断在关键时候突破消息封锁，对执政者予以公正的批评或肯定，报纸销量激增。这事现在说来容易，但当时只要处理稍有不慎，各种政战和情治力量就会全力反扑，足以让报纸一天之内关门。站在宏观角度，“五四”以后萌芽的自由主义，1949年后在两岸留下了不太一样的足迹。在台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因言贾祸，但他入狱主要不是反当局的言论，而是因为要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主张付诸行动，这才真正犯了大忌。至于像《中国时报》这种自由派报纸仍然能温和稳定地向前迈进，从那段期间《中时》发表的掷地有声的社论即可见一斑，以下举出一些社论



图9 1960年代,《中国时报》的派报工作由脚踏车转变为吉普车。

的标题，如“废止出版恶法，维护言论自由”、“我们对雷案的思想”、“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为当前政治情势向朝野进一言”、“维国法之大防 行宽恕之仁政——我们对高雄事件起诉的观点”、“宪政体制必须完整，国土不容分裂”、“跨出民主宪政历史性的一大步——执政党通过‘解严’及‘开放组党’决议案”等等，以上的社论都是当台湾处于政治转折点上而执政当局尚未充分拿定主意时，《中时》即以鲜明的立场直接表态，领导舆论的方向，最终成为事实。

### 关键时刻的坚定立场

尽管如此，政治体制毕竟只是上层建筑，台湾民主化最终却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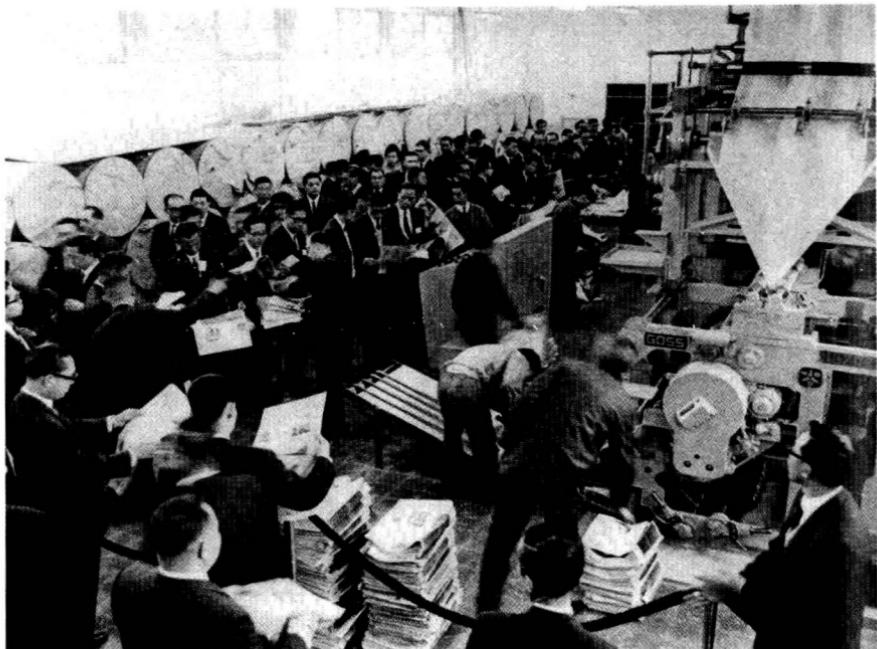


图10 1968年,《中国时报》由美国购买照相制版彩色轮转机,开启中文报业彩色印刷的时代。

赖于经济与社会的质变。随着生活的大幅改善,台湾百姓关心的层面也不断扩大,从政治到财经、社会、体育、文学、娱乐、家庭、旅游等等,信息的需求激增。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一般百姓都知道《中时》社会版的新闻特别好看,《中时》的文学版上则刊载大量年轻新秀的文章,也介绍了许多具有前瞻意义的文学和美术作品。如果形容《中时》已成台湾政治、社会和文化自由派的大本营,丝毫不夸张。余纪忠便是这艘自由大船的船长,向许多一时遭挫的文人提供及时的支持与济助。作家陈映真、龙应台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作品都是在《中时》首先刊出。那时,《中时》的销量和影响力都已超过了《中央日报》。进入80年代,《中国时报》更发展成台湾的报业龙